

好文章是“磨”出来的

谈谈如何写好文章

HAO WENZHANG SHI
MO CHULAI DE

TALK ABOUT
HOW TO WRITE
A GOOD ARTICLE

许海清◎著

文章千古事 文章乃经国大业 非常之业必有非常之文 三篇文章做得好 思想是文章的海拔线 四面江山来眼底 万
不到心头 文章好比一棵树 无逻辑不成文章 文章不写半句空 领异标新二月花 为文喜见风雷笔 写文章要看对象
只说家常话 功夫在诗外 文如其人 好文章是“磨”出来的 方法的方法比方法重要 读万卷书写万篇文 盛世出文



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

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Publishing House

好文章是“磨”出来的

许海清◎著



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
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好文章是“磨”出来的——谈谈如何写好文章/许海清著.
北京: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, 2014. 3
ISBN 978-7-5035-5217-5

I. 好… II. 许… III. 汉语-写作-文集 IV. H15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56993 号

好文章是“磨”出来的——谈谈如何写好文章

策划编辑 王 君
责任编辑 蔡锐华
版式设计 李 灵
责任校对 马 晶
责任印制 宋二顺

出版发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
(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)

邮 编 100091
网 址 www.dxcbs.net
电 话 (010) 62805800 (办公室) (010) 62805824 (发行部)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双青印刷厂
字 数 152 千字
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70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印 张 10.5
定 价 22.0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

目 录

- 第一讲 文章千古事 (1)
- 第二讲 文章乃经国大业 (9)
- 第三讲 非常之业必有非常之文 (17)
- 第四讲 三篇文章做得好 (25)
- 第五讲 思想是文章的海拔线 (33)
- 第六讲 四面江山来眼底 (41)
- 第七讲 万家忧乐到心头 (49)
- 第八讲 文章好比一棵树 (57)
- 第九讲 无逻辑不成文章 (65)
- 第十讲 文章不写半句空 (73)
- 第十一讲 领异标新二月花 (81)
- 第十二讲 为文喜见风雷笔 (89)
- 第十三讲 写文章要看对象 (97)

第十四讲	佛家只说家常话	(105)
第十五讲	功夫在诗外	(113)
第十六讲	文如其人	(123)
第十七讲	好文章是“磨”出来的	(131)
第十八讲	方法的方法比方法重要	(139)
第十九讲	读万卷书写万篇文	(147)
第二十讲	盛世出文章	(155)
尾言絮语		(161)

文章千古事

第一讲



我经常对人讲，中国是文章大国，很多人都很赞成。回首历史，自仓颉造字以降，中国以其丰厚的文化底蕴、不绝的文化遗产，造就了灿若繁星的文章大家、浩如烟海的佳作名篇、科学系统的文章学理论，成为中华民族光辉灿烂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。

—

纵观历史，中国的文章大家、佳作名篇层出不穷。中国文章的起源可以一直追溯到远古时期的歌谣和神话传说，在据传为神农和尧舜时期的《蜡辞》《击壤歌》《康衢谣》《卿云歌》等歌谣中，已经出现单纯质朴的韵语。在甲骨文字和青铜器铭文中，开始出现用于记事的相当成熟的文字系统，标志着中国书面文章发展的萌芽。先秦时期，正式开启了中国书面文章的发展繁荣历程。从先秦的诸子百家，司马相如等汉赋大师，以“三曹”“建安七子”“竹林七贤”为代表的魏晋文学典范，到唐宋两代的李白、杜甫、王安石、苏轼等伟大诗人、词人和开创古代文体新模式的“唐宋八大家”，到关汉卿、王实甫、马致远等元曲名家，明清两朝的白话小说家，五四运动之后涌现出来的一大批现当代文学家文章家，可以说，在中国漫长历史中的每一个时期，都产生了继承传统文化、契合时代特征、开创崭新领域的大师级人物。在他们的引领下，形成了覆盖广泛、内容丰富、思想深刻、雅俗共赏的文章宝库，这其中既有《诗经》《楚辞》等诗歌典籍，也有《孟子》《韩非子》等政论文章；既有《史记》《资治通鉴》等历史著作，也有《水浒传》《西游记》等白话小说；既有《弟子规》《千字文》等通俗读物，也有《易经》《传习录》等哲学经典。这些佳作名篇经过古人的筛选、编辑，结成了以《昭明文选》《唐宋八大家文钞》《永乐大典》《古文观止》《四库全

书》等为代表的名家名著选本，仅现今存世的就数以百计，不仅有效承载了文章大家的成果，普及了传统文化，更为历史研究、文学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，有力推动了中华文明不断向前发展。

历朝历代，文章及其作者都拥有相当崇高的地位。在古代文献中，对于文章的社会地位多有阐述。《周易·系辞上》中提出，“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”；《典论·论文》中认为，“盖文章，经国之大业，不朽之盛事。年寿有时而尽，荣乐止乎其身，二者必至之常期，未若文章之无穷。是以古之作者，寄身于翰墨，见意于篇籍，不假良史之辞，不托飞驰之势，而声名自传于后”；《文心雕龙·原道》中也写道“文之为德也大矣，与天地并生者何哉？”进而又细化为“道沿圣以垂文，圣因文而明道”，可以说都将文章摆到了极高的位置。《左传》有言：“大上有立德，其次有立功，其次有立言，虽久不废，此之谓不朽。”文章因而成为达到老子所说“死而不亡”境界的途径之一，而相比立德、立功，立言更多可以凭借自身的努力，并且德行事功要传诸后世，必然要借助文章的力量。于是，在追求“不朽”的动力驱使下，文章之道成为历代有识之士的高尚追求并不断被加以传承。在这种氛围和传统下，作为文章创作主体的文人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和尊敬就不足为奇了。在春秋战国时期，“士”的内涵逐渐由武士被文士所取代，并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。他们虽然没有贵族的地位，但也不用像庶民那样从事耕作，而是作为贵族的家臣、谋士，为重要决策提供参考，甚至“一言可以兴邦，一言可以丧邦”。汉朝时，皇帝宠用有才华的官吏，通过“策对”和察举孝廉选拔上来的读书人，经常被加以侍中、常侍、给事中之衔，协助处理奏章。汉武帝之后，“六尚”之一、本来是管理皇帝文书的尚书开始负责起草诏书，地位不断提高。隋朝开创了科举制度，而科举制度最重要的考核方式就是写文章，从而使写文章成为学子士人出仕做官的必要条件，选拔出的人才自然也是写文章的高手。唐朝时，负责处理奏章、拟定诏书工作的，外有中书、门下、尚书三省，内有馆院、翰林学士，其中大部分是文人，当时宫殿前的台阶上立有巨大的石螭，文人、学士们站在台阶前朝见皇帝，被称为“独占鳌头”。这些人不仅可以左右皇帝的旨意，甚至有时能够驳回皇帝的旨意。皇帝的命令如果未加盖“中书门下之印”，当时即为违

法，不能被下面各级机关承认，所以有“不经凤阁鸾台，何名为敕”（凤阁、鸾台即为中书省、门下省）的说法。宋朝更是从太祖赵匡胤开始就传下了“不杀读书人”的祖训，足见对文人的重视程度。不仅宋太祖亲自叮嘱宰相赵普多读书、读《论语》，且后来的范仲淹、王安石、司马光等文章大家都曾在朝中身居高位，整个社会掀起“崇文”的风气，带动了文化的极大发展。明朝时，设中极、建极、文华、武英四殿和文渊、东阁两阁，其中的大学士地位尊崇，常由六部尚书或经筵讲官（皇帝的老师）兼任，一切奏章、政事、诏令都要经他们的手，掌有对皇帝朱批的“票拟”之权，在皇帝年幼时，在某种程度上履行了皇帝的职责。清朝时，虽然另设军机处办理重要奏章和皇帝密谕，但军机大臣也是由内阁大臣中挑选出来的，实际上仍然是文人在直接辅政。

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于写文章极为重视，就如何写文稿、怎样改进文风等进行过详细的论述和指示。其中，作为文章家、著作家的毛泽东谈得特别多，著有《纠正文字缺点》《反对党八股》《工作方法六十条》等大量相关作品。他提出，“一切较长的文电，均应开门见山，首先提出要点，先用极简要文句说明全文目的或结论，唤起阅者注意，使阅者脑子里先得一个总概念，不得不继续看下去。有些写得好的报告，虽然篇幅颇长，却能引人阅读，使人不厌其长，有些写得不好的报告，虽然篇幅不长，却使人难看。”“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，生动活泼的，表现实际生活的。我们很多人没有学好语言，所以我们在写文章做演说时没有几句生动活泼切实有力的话，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，像瘪三一样，瘦得难看，不像一个健康的人。”“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这样三种性质：准确性、鲜明性和生动性”。这些重要论述，观点深刻、指导具体，而且形象生动，对文章写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。不仅如此，党和国家领导人还亲身实践，撰写了大量重要文章，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巨大作用。

二

几经传承，中国逐渐形成完备的文章学体系。在文章写作实践

中，中国历来重视文章学理论的探索和完善，在什么是文章、如何写文章、如何评价文章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，积累了宝贵的思想财富，形成了科学的理论体系。早在春秋战国时期，儒家学者就借虞舜之口在《尚书》中提出“诗言志，歌永言”，对各类文章的功用做了探索性的区分。陆机的《文赋》、钟嵘的《诗品》、刘勰的《文心雕龙》、昭明太子的《文选》，带动了文章学走向独立，使得文章学第一次获得了科学意义上的系统研究，标志着中国文章学基础理论初步构建完成。唐宋时期，不仅以经、史、子、集为对象的“注疏文章”极大繁荣，文章家们对“骈文”和“古文”的写作手法也不断革新，文气、文势、文法等文章学中的重要概念不断问世并得到深入阐述，丰富和完备了既往的文章学理论。明清时期的文章评注，不仅集合了前期历代文章学的研究成果，还对古典文化的向心凝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，使文章学达到了新的高度。五四运动之后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，文章大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，继承传统文章学的精华，同时吸收西方美学理论、文字学理论、语言学理论等优秀成果，推动中国文章学不断走向科学化、系统化、现代化。

中国的文章学涵盖广泛，涉及到文章分类、写作、批评、功用等多方面的研究，内容不断完善，体系博大精深。以公文分类体系为例，西周时期，下行的王命文书仅有“诰、誓、命”几种，上行文书为“上书”，各诸侯国和官吏之间的平行文书也只有“檄文”“移书”等。到两汉时期，下行文书就已经细分为“制、诏、策、册、敕、教、令、谕、符、檄、旨”等一二十种，上行文书细分为“奏、章、表、驳议、牒、申、启、呈、笺、题、状”等多种，平行文书也增加了“关、咨、照会”等分类。后来几经变革，新中国成立后，先后从国家层面几次对公文种类进行重新划分，现行文种变为13类13种。公文分类体系仅是中国文章学中的一部分，其发展、变化的内容竟如此丰富，由此可对文章学体系之庞大窥豹一斑。

文章学的发展不仅带动了辞章、训诂、注疏、声律等诸多学科的产生和发展，还成为中国古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写作教育肇始于西周，在孔子的私学教育结构中正式成为独立的学科——言语。而随着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对于“士”的重要性认识的提高，出现了专门的

养士场所，实际上也就是早期进行文化教育的半官学，其中最著名的当属齐威王或是更早一点的时期兴建的稷下学宫，这所学宫一直延续到齐国的灭亡，对战国时期思想文化的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，当时著名的孟子、邹衍、荀子等都曾在此停留、著书，荀子还曾担任过学宫祭酒，相当于现在的大学校长。到了东汉时期，出现了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文艺专门学校——鸿都门学，生员专攻尺牍、小说、辞赋、字画，其中“尺牍”包括“章”“奏”“表”“驳”“书”等实用文体，小说、辞赋等则属于审美文体，彼时的教育已经涵盖了实用与审美文体两方面的教育。南北朝时期，宋文帝开设文学馆、玄学馆、史学馆、儒学馆，其中文学馆专门从事文章研究与教学，将写作课程与其他学科并列，自成一体。科举制度建立后，文章写作能力正式成为政府考核、选拔人才的重要标准，其受重视程度远非其他学科可以相提并论。可以说，正是这种通过文章发现人才，经由人才完善理论的良性循环，促进了中国文章学的极大发展。

三

俯古观今，“文章合为时而著”，文章始终受到高度重视的根本原因，源于其在社会实践中发挥了并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。一是承载文明。“文以载道”，文明成果要通过文章向下传承。“《诗》，所以会古今之志者也；《书》，□□□者也；《礼》，交之行述也；《乐》，或生或教者也；《易》，所以会天道人道也；《春秋》，所以会古今之事也。”正如上述《郭店楚简·语丛》所论述六经的重要作用一样，内涵深刻的诸子学说，华美典雅的诗词歌赋，饱满厚重的古代历史，在形成文章之后，才能穿越几千年的漫长岁月，使今人能够近观古人。试想没有《论语》，我们怎能系统了解孔子的伟大思想？没有《二十四史》，我们怎能详细知晓历史上的重大事件？没有《红楼梦》，我们怎能切身体验当时的社会风俗？在世界四大古老文明之中，古埃及文明和古巴比伦文明都起源于公元前4000年左右，古印度文明起源于公元前2300年左右，它们都已经衰落，只有中华文明从未中断并延续至今。这其中，文章的承载作用提供了重要支撑。二是教化大众。人非生而知之，需要通过教育明辨是非、知悉

事理，尤其是在古代没有普及官办教育的情况下，通过文章发挥教化作用始终占据着重要的地位，受到文章家的普遍重视。孔子论诗时说，“诗可以兴、可以观、可以群、可以怨。迩之事父，远之事君，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”，推而广之，强调的不仅是诗，也是全部文章的教化作用。而文章中的“纪实”“讽喻”“寄托”“想象”等诸多手法，也多是为了更加激发人的兴趣，起到更好的教化效果而采取的艺术手段。从彰显微言大义的《春秋》，到半部可治天下的《论语》，再到为“六经国史之辅”的《醒世恒言》《警世通言》《喻世明言》，历代文章对教化作用尤为重视。这种教化不仅针对普通民众，也适用于治国理政者。民众被教化，可以“经夫妇、成孝敬、厚人伦、移风俗”，治国理政者被教化，可以施仁政。三是凝聚民心。中国幅员辽阔，地貌复杂，在古代交通、通信并不发达的条件下，通过各种政令和军事手段只能在行动层面维护国家统一，在思想层面却无法保持国家整体的凝聚力，尤其是对底层民众，很难使其时时刻刻与国家发生必然的关联，也就无从进行有效的治理。文章凝聚民心的功用由此凸显。通过《论语》《三字经》《弟子规》《增广贤文》等易被大众接受和便于口口相传的文章作品，使全国民众形成统一的、朴素的价值观，这种价值观既与广受推崇的儒家思想一脉相承，表述方式又更贴近实际，不仅是民众处理日常生活问题的指南，更是其对国家产生认同的基础，从而使中华民族历史上多次在短暂分裂后重新形成团结、统一的多民族国家。

中国的崇文传统一以贯之。身处这样一个具有“以文辅政”优良传统的国度，回望先贤往圣的精神丰碑，重温文章大家的佳作名篇，我们没有理由忽视文章的作用，没有理由低估文章的地位，没有理由不将到达文章写作的更高境界作为自己的追求。我们当前正在进行的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事业，理所当然要勤于学、潜于心、敏于行，将所习、所思、所成体现到文章中，更好地服务于空前伟大的事业。

文章乃经国大业

第二讲



曹魏开国皇帝曹丕在《典论·论文》中明确提出：“盖文章，经国之大业，不朽之盛事。”作为杰出的政治家和文学家，曹丕把写文章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，道出了文章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。文稿格局之高低、气象之雄弱、思想之典俗，不仅代表作者的思想境界，而且反映一个时代的气象。时代之雄盛，朝代之兴旺，往往伴随着文稿之隆盛、之峥嵘。古今中外的文明发展史表明，凡是比较昌盛或重要的时代，文章都被作为治国理政的大事摆在重要位置，帮助执政者延伸治理领域、提升治理能力，打造“纸上江山”。

一、中国历来高度重视“以文治国”

中国古人对文章的政治作用有清醒认识，有过很多论述。孔子认为，诗可以考察社会政治和人心得失，可以团结人，可以抒发怨愤不平。近可以侍奉父母，远可以侍奉君王。黄庭坚说：“文章功用不经世，何异丝窠缀露珠。”意思就是，写文章如不能经世致用，造福社会，就像蛛网上的露珠，没什么用。欧阳修说：“文学止于润身，政事可以及物。”欧阳修、苏东坡这样的大文学家写的有价值的诗文，绝大多数是其参政议政的反映、记录与武器，用于个人遣兴娱情的不多。今看《东坡全集》计33卷，除1—9卷为赋、诗、词外，10—33卷全是各体公私实用文章，含论议、策问、史评、表状、制策、诏告、书柬、尺牍及记传碑铭赞序题跋杂记之类，无一篇没有特定的实用场合、特定的写作程式。就连诗词赋这类“纯文学作品”中，相当一部分也是为参政议政服务的，是“唯歌生民病”的。司马光用19个春秋，完成了《资治通鉴》这部编年体的辉煌巨著，全书上起东周威烈王，下迄五代后周世宗，记载了1362年的历史，蕴含了15个朝代的兴衰荣辱，共294卷。宋神宗读后，认为这部书能“鉴于往事，资于治道”，因而有“资治通鉴”的命名。

文章被封建王朝作为重要的统治工具。刘邦称帝之后，陆贾经常找机会与他谈论《诗经》和《尚书》等儒家经典，刘邦很不耐烦，训斥陆贾道：“老子的天下是靠骑在马上南征北战打来的，哪里用得着《诗》《书》！”陆贾回答说：“您在马上可以取得天下，难道您也可以在马上治理天下吗？商汤和周武都是以武力征服天下，然后顺应形势以文治守成。文治武功并用，这才是使国家长治久安的上策啊！从前吴王夫差、晋卿智伯都是因极力炫耀武功而使国家灭亡；秦朝也因一味使用严酷刑法不知变更，最终导致灭亡。假使秦朝统一天下后，行仁义之道，效法先圣，那么，陛下您又怎能取得天下呢？”刘邦听后虽然有些不悦，但还是觉得陆贾的话很有道理，脸上露出惭愧之色，对陆贾说：“那就请你尝试着总结一下秦朝失掉天下、我们得到天下的原因在哪里，以及古代各个王朝成功失败的原因之所在。”于是，陆贾就奉刘邦之命一共撰写了12篇文章。陆贾每写完一篇文章就进献给刘邦阅览，刘邦对每篇文章都赞叹不止，刘邦身边的大臣们看了陆贾的文章，也都感慨异常。陆贾将这些文章编纂成书，命名为《新语》。从此，刘邦就用陆贾的建议治理国家。秦汉之后的封建王朝，都十分重视文章在统治中的重要作用，这一点在清朝表现得最为突出。康熙、雍正、乾隆都在机构、制度等方面做了很多改进和调整，有效实现了“马上抢政权，文章稳天下”的目标。

文章对近代中国革命发展起了积极作用。在辛亥革命中，革命党之所以能够胜利，舆论宣传功不可没。清廷在宣布预备立宪以后，在意识形态方面就已完全被动。清政府不重视、不善于利用以报纸杂志为主的新式媒体，在革命党人凌厉的舆论攻势下，节节败退，民心逐渐丧失。革命党人牢牢地掌握着舆论宣传的主导权，在海内外有几十份革命刊物，仅在上海就有《苏报》《民呼日报》《民立报》等10多种。于是，武昌城里的星星之火，迅即转化为燎原之势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国统区大批戏剧工作者组成流动演出队，走向农村、内地和前线，郭沫若、老舍、夏衍等作家创作了许多抗日题材的剧作，充分发挥了戏剧为抗战服务的积极作用。被戏剧界称为“好一计鞭子”的三个短剧（《三江好》《最后一计》《放下你的鞭子》）几乎演遍了大江南北，激起广大民众抗敌救国的热情。1938年3月27日，“中

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”成立，提出了“文章下乡，文章入伍”。国统区的文艺刊物都大篇幅地发表通讯和报告文学，如实地反映全国军民浴血抗战的史实，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，推动了中国抗日运动的高涨。

文章对解放战争的胜利发挥了神奇效能。毛泽东发了几篇新闻稿，就曾经吓退 10 万国民党兵。1948 年 10 月，党中央进驻河北建屏县（今属平山县）西柏坡。傅作义探知情报以后，准备出动近 10 万大军突袭中共首脑机关。当时国共主要战场在东北和西北，而党中央周围卫戍部队仅 1 万多人，形势十分危急。10 月 26 日，毛泽东处理完几项重要工作以后，自言自语道：“要给傅作义一点厉害看看。”周围的人不明白：“我们身处险境，还要给别人厉害看？”只见毛泽东拿起笔，很快以新华社记者名义写了一篇评论：《动员一切力量，歼灭可能向石家庄进扰之敌》。评论中把傅作义侵犯石家庄的种种图谋，包括各部队番号、将领以及作战计划等予以揭露和公布，号召解放军和民兵在 3 天内做好歼灭敌人的准备云云。这篇文章马上由新华电台广播，傅作义见我方对他们的计划了如指掌，还做了准备，深怕遭到埋伏，只好偷偷将刚开出来的部队撤回北平。这出现代“空城计”就这样结束了。以后中共中央一直驻在西柏坡，直到进北京。

文章推动了伟大的中国改革开放事业。1978 年 5 月 11 日，《光明日报》刊登题为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的特约评论员文章。当日，新华社转发了这篇文章。5 月 12 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和《解放军报》同时转载。文章论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“实践第一”的观点，鲜明地指出任何理论都要接受实践的考验。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，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内容。但当时依然存在着“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”错误倾向，这是“四人帮”强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，必须坚决打碎。这篇文章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冲锋号，引发了关于实践、真理问题的大讨论。党内外绝大多数人支持和拥护文章的观点，这就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创造了思想条件，对解放思想、推动改革开放进程产生了空前巨大的历史影响。